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
Zhongguo Chuanmeidaxue DianshixiBoshiwenku

德国双轨电视制度研究

Deguo Shuanggui Dianshi Zhidu Yanjiu

曹晚红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
Zhongguo Chuanmeidaxue DianshixiBoshiwenku

德国双轨电视制度研究

Dequo Shuanggui Dianshi Zhidu Yanjiu

曹晚红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双轨电视制度研究 / 曹晚红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7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

ISBN 978 - 7 - 5043 - 5862 - 2

I. 德… II. 曹… III. 电视事业—管理体制—研究—德国 IV. G229.51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6488 号

德国双轨电视制度研究

曹晚红 著

责任编辑 常 红
封面设计 丁 琳
版式设计 张智勇
责任校对 谭 霞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v.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4 (千) 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862-2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10年前，新世纪的大幕刚刚拉开，电视系就已开始着力推动年轻教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工作，将教学、科研和新闻实践紧密结合。到现在将近十年了，他们次第完成学业，一起完成的是从不同视角对当前色彩斑斓的媒介景观的关照和研究。当一本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批青年学者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道路。

几经努力，这套“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博士文库”终于问世了。这套文库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从他们身上，我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动笔写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释然、一种期待，同时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心。

这套文库关注的均为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之中的新课题和新现象，用前沿性来评价并不为过。前沿意味着创新、意味着锐气，他们或者关注着最新的命题，或者选择了最新的视角，或者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有新的论证材料……这套文库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更多人关注他们默默的耕耘，让他们有机会与大家沟通、交流，我为此而释然。

但是，博士论文的完成，不过是学术研究的开始。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迅猛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但是，随着数字化、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新闻事业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的新闻传播体系大而不强，缺乏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还需要深入研究新闻传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加强新闻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加大现代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力



度。期待着这一批青年学者能够继续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期待着他们能够在新闻学教育中发挥更大的能量。

在这样的释然和期待之外，还是会有一丝隐隐的担心。因为这些年轻的博士大多为我多年前的学生，现在的同事，看着他们成长。有时候，越是没有距离，越有可能无法客观地看待他们的研究。尤其在当前学术浮躁的背景下，博士论文应当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也许要求所有的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在这些昔日的莘莘学子今天的青年才俊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时候，我们愿意“送上一程”，更愿意与他们共同传承严谨务实、追求卓越的治学风范，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浮华、学术虚假，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输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智力产品。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

高晓虹

2009年4月

十年前,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曹晚红还是一个学生气十足的青年,她20岁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在新闻实践岗位上历练了三年。1998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新闻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从师生到同事,我亲见了她的成长、积累和努力。2003年曹晚红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又从同事成为师生。这一次的转换以及后来五年的学业沟通和生活交往,让我看到了一个年轻教师从稚嫩逐步迈向成熟的路径和成果。

边从事教学边攻读博士学位,又是教师又是学生,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她努力地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读博期间,积极参与完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创新研究》、《“非典”时期中国电视报道研究》等课题,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也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我们共同探讨如何选择既有独特性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博士论文选题之际,她获得了出国访问学习的机会,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在德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调研。面对这一机遇,我们对博士论文选题有了新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资助下,我也曾两次赴德国进修考察德国电视,足迹几乎遍及德国各州的中心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ARD为各州电视台的联播)及德国电视中心ZDF(通常称为德国电视二台),对德国电视的机制、运行模式有切身的感受,印象颇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私营电视台雄霸天下,公营电视处于弱势地位不同,德国的公营电视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一点与中国电视的情况更为相近。利用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把德国电视作为研究对象做比较研究,成为我们的共识。论文开题时,细听了各位专家的意见,最终论题从中德电视比较研究转而确立为德国公营电视与私营电视的比较研究。在公营电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德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了公营和私营体制双轨并进的改革探索,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现状和电视改革的实际,做好德国公营和私营电视的比较分析研究,不仅有现实借鉴意义,更凸显了论题的前瞻性。在此之前,也有详尽介绍德国电视的相关博士论文,但专注于公营与私营电视体制的比较,在当时我们的视野中尚属空白,对博士论文来说,做首创型的研究更显其价值。

在德国进修学习期间,她为论文写作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工作,在美丽的莱茵河畔的美茵茨大学,她参加了博士论坛和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她把位于美茵茨市的德国最大的电视台ZDF作为实践考察基地,感受德国电视的氛围,并对一些电视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德国学习这一年中,我们常就论文写作的思路进行沟通,深感她学习的努力和科研态度的严谨。在认真做好调研工作的同时,她还尝试了西方学术界以定量分析为主要依据的研究方法,这与我国学术论文更多的定性分析不同,更需要作者下工夫进行数据的分析整理。从她的论文来看,首先数据均为当时最新统计和最具权威性的,部分

来自德国最大的数据调查公司 GfK，部分来自科隆媒介经验研究研究所（IF-EM）。而她对数据的梳理分析，彰显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收获总是与耕耘成正比的，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扎实的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和比较研究，并显示出一定功力的写作水平，不仅顺利通过了严格的匿名评审，论文答辩也受到了专家学者的首肯与好评。论文独特的选题在实践层面，对国外电视改革经验的引进可以汲他之长；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学术视野，以新的角度充实中国电视的理论研究。

中国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句话中包含着的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比较的视野吧。

有观照才能知瑕疵，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在这样一个信息交流极其频繁的时代，视野可以决定视界，视界影响境界，人生如此，学术亦然。

借此序，祝所有和曹晚红一样的年轻学人打开视野、拓宽视界，拥有宽广深远的学术和生活境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叶凤英

2009 年 4 月

目 录

序	叶凤英 1
绪 论	1
第一章 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发展变迁	20
第一节 “二战”之前的广播电视制度变迁	21
第二节 “二战”后到 1984 年：公法广播电视制 度的垄断时期	26
第三节 1984 年至今：双轨广播电视制度	34
第二章 公法电视与私营电视的制度体系比较 ..	42
第一节 双轨制度的法律保障	42
第二节 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的制度体系比较	49
第三节 双轨制度特征分析	60
第三章 公法电视与私营电视的传播竞争	65
第一节 公法电视与私营电视的节目竞争策略 比较	66
第二节 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的节目比较	74
第三节 节目品质与节目多样性	88
第四章 公法电视和私营电视的市场竞争	96
第一节 “电视市场”的界定和内涵	96
第二节 电视观众市场的竞争	100
第三节 电视广告市场的竞争	106
第四节 市场竞争的后果	110
第五节 电视市场的兼并与集中	114
第六节 私营付费电视步履维艰	116



第五章 双轨制度的未来发展	119
第一节 双轨制度面临挑战	119
第二节 双轨制度存在的价值	129
第三节 双轨制度未来发展的前提：对公法电视的 制度保障	133
第四节 德国电视的数字化战略	136
结语：中国广播电视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138
参考文献	145
后记	151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一) 中国：传媒发展遭遇体制障碍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变革和发展历程，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媒介景观。随着当前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媒介生态的全面转型，广播电视事业也进入了一个盘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制约广播电视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凸显出来，其核心在于现行体制中媒体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双重角色（“耳目喉舌”和市场主体）集于一身，已成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

我国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是按照 1983 年中央、省、地、市“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电视台建设方针而建立的，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全行政性的管理体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也对广播电视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表现为行政垄断与市场竞争的矛盾、事业属性和企业化管理的悖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混合等。广播电视媒体既要服从市场规律，又要履行政府的宣传职能，因而呈现在荧屏上的既有国有媒体的信息、教育、服务类节目，又有商业化媒体的对成功的娱乐节目的简单模仿和抄袭以及频繁在正常节目中插播的商业广告，对于传媒转型期的这一失衡现象，有学者称之为媒体的“精神分裂症”。这其实反映出媒体在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夹缝中的生存现状，而现行的广播电视制度面对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转型，表现出滞后和发展的不均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现行传媒制度，成为

“解放传媒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①。

传媒制度，“是特定社会制度下社会组织对资源进行配置、管理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方式”^②，广播电视制度则是“一个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赖以建立和组成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方法”^③。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看，指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的格局以及国家进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制度；从广电机构本身的层面来看，指它的所有制、组织结构方式和经营机制。广播电视制度在中国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有关制度创新的敏感课题探讨一直不够充分。2006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发出《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有关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改革不断破除制约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机制性障碍的讨论在学术界活跃起来。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产业的体制改革问题也得到充分的讨论。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正是一次次思想解放，使我们突破了旧的思维方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④可以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体制和机制就创新到什么程度。当前继续坚持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要提出认识事物的新理念，寻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突破旧体制约束的有效路径。

这无疑为我国传媒事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解放思想，就是要更新观念，在实践和探索中寻找制度创新的新路径，推动传媒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加快。

从当前的政策安排来看，原来单一的行政事业模式被划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力争促使两者协调发展是当前制度模式选择和制度保障的核心。由于传媒产业具有产业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承担着宣传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角色，完全的行政管理会导致传媒产业失去活力，而完全的市场化又可能导致“市场失灵”。那么，在全球化环境下面对海外媒体集团的竞

① 喻国明：《中国传媒业的历史方位与现实趋势》，《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4期。

② 童兵：《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总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③ 郭振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赵长茂：《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9月。

争和挑战,如何既保障媒体公益责任的实现又释放出产业的活力?如何在广播电视事业的体制建构中平衡市场、政府、公众的力量,又如何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实现这种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很多学者摒弃了所有制问题的局限,将自己的思路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视野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性地比较分析世界范围内较成熟的制度范式,为解决转型期广播电视改革的关键性和决定性问题——制度创新寻找借鉴。

(二) 世界:四种基本制度模式

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是1920年在美国匹兹堡市开始播音的KDKA广播电台,世界上最早的电视台则于1929年在英国试播,1936年正式开播。“二战”后电视在欧美逐渐普及。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无线电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信息传播史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广播电视又是多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从20世纪20年代欧美国家陆续出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始,就面临着广播电视制度、传播政策和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这个新兴的媒体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使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分配有限的无线电频谱资源?如何平衡市场利益、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决广播电视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

广播电视制度的建立,受到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同时文化传统、地缘关系、人口、语言等也都影响着广播电视制度的建立。如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言:“由于历史、地理分布、文化和政策的根源不同,使得媒介体制间长期存在着差异。”^①不同国家采取的不同的广播电视制度,都是植根于各国特定的社会制度,在各国广电事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根据广播电视与国家的关系,其制度模式主要可分为四种:

第一是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私营商业广播电视模式(私营商业制)(Commercial Broadcasting),美国是实行商业电视模式的典型例子,拉丁美洲国家受美国的影响,大多实行商营体制,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没有照搬美国的广播电视体制。

在这一模式中,广播电视业完全遵循商业经营思路,按商业公司的方法来运作。国家对广播电视和对其他私营企业一样,只制定相应的基本的法律法规,财政来源来自于节目时间的出售。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在激烈的相互竞

^① 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17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进行传媒产业政策和体制的重建,以适应国际传播竞争新格局的需要。最大的制度变迁发生在西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一向以公共服务电视为主的西欧各国开始“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纷纷开放商业广播电视,因此,大多数西欧国家从公营体制转变为公私并存的广播电视体制。私营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广告收入,公营广播电视的财政来源以收视费为主,有的包括部分广告收入。国家通过公共机构进行监管和宏观上的调控。

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市场化转型使得原来公营垄断的广播电视系统被以市场为主导的私营广播电视系统占据了优势地位。与这些国家不同,德国目前也实行广播电视双轨制度,即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制度和私营商业广播电视制度双轨并存,但是二十多年来,公私两大系统在竞争中互动、博弈并实现了相对的平衡,这使得德国个案具有比较强的实践意义和研究价值。

就在2006年,在国内学术界对广播电视制度创新的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笔者获得了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全额资助,作为访问学者赴德国留学,在德国美茵茨大学(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新闻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调查、访问和进修。带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制度创新的疑问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期待,走访了德国的部分电视台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对德国电视双轨制度的组织结构、制度保障和实际运作进行了具体的考察。

(三) 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取向:公益与市场间的平衡

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金属活版印刷术在这里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也出现在这里,德国人崇尚音乐和哲学,文化素养比较深厚。然而,德国的发展道路却充满了曲折,多年封建割据,两次世界大战在这里策源,人类历史上的暴行——集中营和大屠杀也出现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体现出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很快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与之相对应,德国的文化和新闻事业也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目前是世界上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

德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也对广播电视制度取向有直接影响。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来看,一般而言,民主制度与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同步发展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国家控制一切的集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时



代，向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化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①时代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经济和法律实践的认同过程”^②。这种政治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为商业机构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在公众利益的维护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现实模式，表现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上，德国模式与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相应，从广播电视诞生到现在经历了多种制度的变迁。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制度范式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其制度的丰富性，其次还表现出这样一些政治和文化特征：第一，建构现行广播电视制度的基本原则：独立性与多元化；第二，现行制度的制度取向是在保障公共制度的前提下，力求公益与市场间的平衡。

1. 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的丰富性

在德国，法制化和制度化被置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广播电视领域也是如此，德国人自豪于言论的多元和自由，而这主要依赖于完善的制度保障。事实上，德国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也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广播电视制度模式，从广播事业刚刚诞生时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的中央行政制度、纳粹时期的中央极权制度、“二战”之后原联邦德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到1984年商业广播电视出现后形成的广播电视双轨制度。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讲，对不同历史时期德国广播电视制度历史变迁的过程、动因进行研究无疑将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2. 建构广播电视制度的基本原则——独立性和多元化

作为公共论坛的一部分，大众传播“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③，不过它本身并不带来民主，从西方国家媒体的发展来看，大众传播既可能推动民主的发展，也可能被用来强化专制极权政治。在阿道夫·希特勒所谓国家社会主义集权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时期，大众传媒就成为法西斯主义政党控制社会的有力工具。

鉴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占领军为彻底消除战争危险，消灭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制度改革和政策确立，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德国广播电视的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独立性和多元化，就是为了防止广播电视成为政府或者政党附庸，反对广播电视体制的集权化，以确保媒体的多元化。因此，在德国，“国家被认为是广播电视节目

① 威权主义：又称权威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是：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权威合法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被认为来自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例如神的意志、天道、专制君权的嫡传、他们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等。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

② 支庭荣：《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第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 同上，第135页。

最恶劣的提供者”^①。

即使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席卷全球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中,虽然自由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德国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制度自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但无论如何发展变化,独立性和多元化始终是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原则,这种独立体现为一种去政治化的、公民参与和多种利益集团的共同协商和平衡。

3. 双轨广播电视制度的取向——公益与市场间的平衡

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实行公私并存的双轨广播电视制度,但是,公共服务电视在很多国家已经日渐式微,明显地在市场份额上低于私营电视。在德国,虽然公共服务电视市场份额下降并且发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其影响力在公众心中仍然非常稳固,从市场份额上来看,也基本和私营电视持平。那么,如何在全球的市场化、商业化潮流中保持公私两大电视系统的平衡,我们需要从德国的广播电视制度体系中寻找答案。

从上述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三个特征中,德国的双轨制提供了一个在公益和市场间保持平衡的制度模式,虽然这一平衡是动态的和相对的,但也为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广播电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广播电视既要承担媒体应有的宣传职能和社会责任,又要作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共领域和商业领域进行平衡,是中国目前广播电视改革的中心问题。

本研究通过分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德国广播电视制度的变迁,考察双轨制度的形成动因及实行过程中两大系统的竞争、平衡与互动,并对双轨制度的未来发展进行理性的思考,希望对中国的广播电视实践和发展有所借鉴,重点是广播电视制度创新的途径,这也是本研究期望实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理论资源

本研究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础,借鉴媒介经济学、社会学、制度学理论,以双轨制度中的公私两大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制度变迁作历史的观照和现实的考察,对公私系统中的节目生产、节目结构和市场结构作具体的分析,从动态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和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双轨制度的未来发展。

(一) 大众媒介的四种理论:传播理念与制度模式

弗雷德·西伯特(Fred S. 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

^① Manfred Kops:《将德国的电视节目卖给中国: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德国科隆大学媒体经济研究所网站, <http://rundfunkoek.uni-koeln.de/institut/pdfs/20005china.pdf>

和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位新闻学者合作撰写的《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报刊的四种理论》），是被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公认为开比较新闻学之先河的论著，也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经典的文献之一。该书于1956年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由于当时报刊居于大众媒体的主导地位，所以书中的“Press”一词，被译作“报刊”，但实际上是指一切大众传播媒介。

该书作者将大众媒介同其所属的社会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潮、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论述了新闻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为研究和了解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几种不同的传媒理论及传媒制度，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应该说，《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对传播控制和传播制度研究的开始。对本研究而言，分析德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变迁，无疑要将媒体的功能、传播理念与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四种理论模式是本研究的一个理论起点。

综合多位学者（芮必峰、郭振之、展江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研究，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

1. 研究视角方面，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

2. 哲学理论的融入。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

3. 历史意义。“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

4. 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

《报刊的四种理论》虽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主要集中于：

1. “四种理论”带有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威尔伯·施拉姆执笔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后来成为传播学者批判的重点。

2. 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报刊的四种理论》在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将重点放在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上，而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尤其是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集中及对传媒的影响探讨太少。

3. “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并且有的详细（如集权主义），有的简略（如自由主义），它忽略了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媒介模式。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媒介体制的变革，“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

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

综上所述,《报刊的四种理论》及其对它的理论修正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媒介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理论视角和理论基础。

(二) 新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

仅仅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不同的传播理念与传播制度的关系,还不足以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历史原因和变迁过程与路径等,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研究广播电视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发现”,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并被广泛地运用于研究当今的制度变迁。新制度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着重于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

当然,新制度主义也存在不同的流派,最著名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osmary. C. R. Taylor)在1996年英国《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①它们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

1.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泛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的制度。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均衡与非均衡形成了整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的供给是创造和维持一种制度的能力,一种制度供给的实现也就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的需求是指当行为者的利益要求在现有制度下得不到满足时产生的对新的制度的需要。^②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③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研究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来源、过程以及路径^④。诺斯认为稀缺性、竞争、认知、选择是制度变迁的动因。他从利益驱动和意识形态两个角度来论证社会制度变迁。关于过程和路径,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① 祝灵君:《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 <http://www.studa.net/minzhu/080701/11371172.html>

② 陈家刚:《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第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 道格拉斯·诺斯:1942年和1952年分别获得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④ 黄晓兴:《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第33页,《青海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